



香港亞太研究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 Lau Siu-kai, PhD(*Min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K\$30.00
ISBN 962-441-039-9

民主化與分離主義

台灣近年的政治發展與兩岸關係

王家英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民主化與分離主義

台灣近年的政治發展與兩岸關係

作者簡介

王家英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鳴謝

這論文的完成得到香港中文大學 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 的資助，而在排印及校對的過程中，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司徒美華小姐及尹寶珊女士亦曾給予大力的幫助，謹此致謝。

摘要

本文探討台灣始自八十年代中的民主化過程，及其如何影響本地政治及兩岸關係。本文的論點是，在兩岸分裂分治及持續國際孤立的客觀條件下，台灣的民主化必然會催生出分離主義的訴求，而後者又將會無可避免地成為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再）定位因素。有鑑於此，本文分析了快速民主化下台北變換中的兩岸和國際政策，以及由此引生的有關兩岸和平統一的各種障礙及有利發展。最後，本文認為在兩岸互動的各種可能結果中，現階段最理性的一種是某種形式的、經雙方同意的自主性統一（agreed-upon autonomous unification），因為它一方面達到了中國人長期渴望的統一目標，另一方面又可給予兩岸人民最起碼的安全感進行長期性的合作互惠，替未來的中國及世界帶來和平及繁榮。

引言

自八十年代中開始，台灣便出現了快速的民主化。然而，由於台灣獨特的歷史及在中國統一問題上的懸壺地位，其民主化並非完全一往無礙，社會福祉亦非泰然俱來。事實上，一方面民主化相當成功地將台灣的威權政體及建制外的反對派挑戰轉化為民主制度，從此政治議價及妥協漸漸成為

© 王家英 1994

ISBN 962-441-039-9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新的政治規範，過去的朝野對抗得到舒緩、化解，一種開放的政治穩定開始浮現；但另一方面，這轉化又同時導致了分離主義運動的興起，後者不單使台灣的未來蒙上陰影，亦對兩岸關係帶來了嶄新的變化及緊張。

本文嘗試探討台灣始自八十年代中的民主化過程，及其如何影響本地政治及兩岸關係。本文的論點是，在兩岸分裂分治及國際孤立的客觀條件下，台灣的民主化必然會催生出分離主義的訴求，而後者又將會無可避免地成為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再）定位因素。此外，本文分析了快速民主化下台北變換中的兩岸和國際政策，以及由此引生的有關兩岸和平統一的各種障礙及有利發展。最後，本文在研究了兩岸互動的各種可能結果後，認為現階段最理性的一種是某種形式的、經雙方同意的自主性統一（agreed-upon autonomous unification），只有透過這種形式的統一，兩岸人民才可能擁有最起碼的安全感進行長期性的合作互惠，替未來的中國及世界帶來和平及繁榮。

民主化

眾所周知，台灣的快速民主政治改革始自蔣經國的晚年，亦即是台灣社會經濟邁向成熟化的八十年代初、中期。不過，對台灣近年的民主政治發展，今天已很少學者會單因地認為它是執政國民黨——特別是蔣經國——主動改革的結果，或是社會經濟成長的自然產物。一般的共識是，台灣的民主化最少牽涉到四個廣闊互動的層面：一是政治反對勢力的壯大及對政治民主化訴求的提升；二是執政國民黨內部部

份精英漸漸產生對政治改革的意向及決心；三是民間社會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而日益成熟及多元化，對國民黨一元統治的威權體制產生挑戰求變的心理；四是來自八十年代世界民主浪潮的影響及國際民主社會（特別是美國）的壓力（Gold, 1986; Chang, 1992:27-34; 蕭新煌，1991：375）。

由於上述四項結構因素的正面配合及互動，蔣經國個人一九八八年一月的突然逝世並沒有使台灣的民主化大潮中斷。他的繼承者李登輝非但沒有改變民主化的進程，反將之加快，特別當他於一九九零年國民大會總統選舉中獲選為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從此他的權力相對地得到鞏固。在蔣氏及後來李氏的領導及各種有利的主、客觀因素推動下，台灣成功地改革或廢除了許多過去威權政治的結構，包括解除戒嚴法、擴大言論及辦報自由、容許反對黨有合法地位、釋放政治犯、減少利用司法系統肅清異見，以及引進四十年來立法院及國民大會首次普選等。

在上述的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應是反對黨的合法化。一九八六年，反對黨民進黨成立。自民進黨成立之後，國民黨並沒有採取任何打壓行動。隨著戒嚴法於一九八七年七月解除，台灣明顯邁進了一個新的政治時代，從此競爭性的多黨政治及議會民主成為政治發展的最重要動力。在新的遊戲規則下，最大在野黨民進黨雖仍遭受到各種不利的存在制度及資源分配因素的局限，但在後來的各級選舉中，仍能快速地發展及鞏固其政黨實力：在一九八九年的立法院補選中，它取得 33% 的總選票；一九九一年的第二屆國民大會全面改選，24%；一九九二年的第二屆立法院全面改選，36.9%；而一九九三年的縣市長選舉，41%（《明報》，一九八九年十

二月四日；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廿二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此外，台灣省長及中華民國總統直選亦分別定於一九九四年底及九六年中舉行。屆時（總統直選之後）台灣的政治改革將完成其階段性的任務，而一個有意義的、透過多黨政治開展的議會民主政治體系將開始全面支配台灣的政治未來。

多黨政治及議會民主的發展導致了政治衝突的制度化，亦大大地減低了國民黨威權統治末期日漸高升的朝野政治對抗，及由此造成的社會不穩定。這可從一九九零年初以來，政治對抗不論在數量還是規模上，均快速下降得到充份的反映（Chao and Myers, 1994:222-229）。隨著勢力的擴張與發展，在野政治團體（特別是民進黨）似乎已開始習慣在漸漸浮現的民主制度中推動政治改革，從而減少體制外的抗爭。

分離主義的興起

雖然如此，民主化必然使台灣在國際社會及兩岸關係中懸而未決的地位進一步複雜化。在民族國家（nation-states）的現代架構中，多黨政治及議會民主的發展又意味著普遍（或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的發展（Greenfeld, 1992:10）。假若台灣是一獨立的民族國家，這將肯定有助於其人民的整合和凝聚，亦會大大強化其國家的合法統治。事實上，當民主改革持續深化，台灣越來越近似一現代民族國家，擁有來自人民的普遍主權，而不像是一更高主權國家下的地方政府。然而，由於其與中國的特殊歷史關係，國民黨

國家（Nationalist State）無視現實世界的絕大部份國家均不承認其中國主權性（那管是在一限定的意義下），仍堅持「一個中國」的理想，並宣稱在台灣中華民國仍代表分裂中的中國的其中一方。此外，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明確表示台灣只是中國的一個省，而且強調在必要時（特別是當台灣走向獨立），它會不惜以武力解決兩岸統一的問題。

持續的國際孤立與兩岸分裂分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潛在的武力威脅，及台灣本土快速的民主化互為糾纏，互為強化，替可追源自五十年日本殖民地統治及後來國民黨的大陸省籍政治支配的分離主義運動增添了巨大的動力（林勁，1993：14-34；王家英，1993；戴國輝，1994：18-30；Chun，1994：8-69）。嚴格而言，台灣的分離主義運動是一場現代意義下的國家文化危機（Chun, 1994），後者直接造成（中華民國）國家認同的模糊、質疑或否定，以及相俱而來的新國家認同的摸索與重構（張茂桂，1993；吳乃德，1993）。台灣的分離主義不應完全與具特殊社會文化意義的民族主義概念（nationalism）等同（Hobsbawm, 1990; Smith, 1986），¹因為大部份的台灣人仍視自己為廣義的中國人或華人（White and Cheng, 1993:176）。甚至一些激進的台獨份子也不諱言，大多數台灣人均是人類學意義下的華人，他們反對的是據此而作的政治解釋。他們一般認為：「擁有相同的語言及族群性並不表示必須擁有相同的國家」（《台獨季刊》，1982：113-114）。另一方面，分離主義亦不必然意味台獨主義，雖然台灣獨立建國是分離主義的一個可能的選擇；例如，台灣仍可繼續保持目前與中國大陸分離但又不走向全面獨立的狀態。整體而言，台灣的分離主義涵括了最少六種互為勾纏但又不盡相同的理念與情感，而不同的分離主

義者從中摘取某些或全部元素作為其認同及行動的基礎。這些理念及情感包括：（一）台灣現有的疆域，特別是台灣本島，是現階段台灣人地理認同的對象，此疆域以外的人，縱使他們同屬廣義的中國人或華人，均只能算是其他族群的人；（二）儘管他們抵台的時間有異，台灣人自身構成一特殊的社群，並享有其共同的歷史、文化及命運；（三）台灣應發展及維持足夠的武裝力量以捍衛台灣的安全及台灣人的自由；（四）台灣的將來——不論是與大陸統一還是獨立建國——均應由其公民自由地、免受暴力恫嚇地決定，而不應由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國際社會任意支配；（五）台灣應享有一與其經濟實力相等的國際地位；（六）不論承認與否，台灣展現出一個與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異的國際人格，因此亦應與其他國家一樣，可以平等地、自主地及充份地參與國際社會的事務（施敏輝，1985；Bush，1992：360；張茂桂，1993：260-270）。

作為一發展中的運動，台灣的分離主義已捲入了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根據「台灣民意調查基金會」的多個調查結果顯示，支持台灣獨立的百份比在過去六年中不斷穩定增長，從一九八八年的 8.2% 升至一九九零年的 12.5%，到一九九二年的 15%，及到一九九三年的 23.7%（《明報》，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而另一個一九九二年進行、並同時較寬廣地解釋分離主義的研究則指出，47.9% 的受訪者支持或不反對台灣獨立建國，而反對者則有 52.1%（吳乃德，1993：47）。此外，絕大多數的台獨反對者並不接受不惜任何代價的統一（《明報》，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相反，他們大多傾向於接受現階段兩岸分離的現狀，因為他們害怕統一後

的共產主義制度會損毀他們在台灣所享受的自由與富裕（Liao, 1991:4.14）。

此外，在民主化大潮之下，甚至國民黨國家亦經歷到快速的台灣化，² 並展現出一不斷上升的分離傾向，特別是在強化國防及以對等或獨立政治實體的方式擴大國際參與等二項國家政策上（詳看下一節）。正如新當選的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在最近的一個雜誌訪問中說：「國民黨在國防與國際事務上，與民進黨的觀點漸趨一致」（*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23, 1994:23）。事實上，很多學者亦指出，在民主化的壓力下，為保持執政黨的地位，國民黨不得不吸收民進黨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亦因此無可避免地在台灣的重新定位上與民進黨趨同（蔡政文等，1993）。這亦即是一般所謂的國民黨「民進黨化」。不過，這裡應該指出，在政黨互動的另一方面回饋下，民進黨亦漸漸放棄了過去激進的台獨訴求，並開始積極尋求一個切合當前台灣人民能夠接受的兩岸政策（《台灣聯合報》，一九九四年八月八日）。在這一點上，如果國民黨存在「民進黨化」傾向的話，民進黨亦應多少出現了「國民黨化」的趨勢。然而，從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度看，不論是「民進黨化」還是「國民黨化」，台灣政治已明顯台灣本位化，而後者正是一分離主義或台獨主義的轉向（《文匯報》，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四日）。

兩岸統一的障礙

無庸諱言，分離主義明顯是兩岸和平統一的主要障礙，亦因此會替兩岸關係的正常化帶來巨大的挑戰。然而，縱使

台灣不走向獨立建國的極端，隨著其民主政治改革的不斷深化，由此而引生的內外客觀政治形勢及相應的主觀認知判斷等的變化，仍然會替兩岸早日統一造成困難。

台灣的內部政治發展及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國際社會的新取向

台灣內部首先亦是最重要的發展，當然是由政治改革所導致的民主化公民國家的出現。如 Andrew Nathan 於一九九零年簡潔有力地指出：

台灣的政治改革改變了中國過去對台政策的基本假設，即國民黨有能力單方面與中共討論台灣的將來問題。民主化已使台灣政治複雜化；現在，沒有島內民眾的支持，國民黨根本不可能與中共達成任何協議。由於統一會對台灣人民帶來巨大的風險，這新的政治現實使北京過去所提出的任何統一的條件看來都是有問題的。（Nathan, 1990:153）

由於民主化會加強台北處理敏感的統一問題的能力，台北為何會在過去幾年間如此積極快速地推動台灣的民主政治改革便昭然若揭了。透過民主化，台北現在擁有更大的空間盡可能以其所能控制的速度，將兩岸關係引導到其所希望的方向發展。

為了因應漸漸由民意推動支配的新的民主政治形勢，國民黨政府放棄了舊日僵固因循的大陸及國際政策（如「賊漢不兩立」），取而代之的是一積極進取的取向處理其與大陸及國際的關係。此新的取向常被稱為「彈性」或「務實」外交，其主要目的是要剷除其過去一直宣稱擁有整個中國主權的虛假意識形態，彈性或務實地對待現階段台灣在中國及國

際社會中存在的問題。或許更具體的說，台北希望扭轉由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取消中華民國會籍後所帶來的國際孤立的困境。為求達到此目的，它展開了一雙重活動計劃，一是指向中國大陸，另一是指向國際社會。

台北指向中國大陸而展開的活動取向是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台灣為一對等的政治實體，並以此為基礎推動兩岸關係的正常化。為此，台北首先開始單方面進行緩和兩岸長期以來的歷史仇讎及猜忌。一九八九年五月，中華民國財政部長郭婉容帶領代表團往北京參加亞洲開發銀行舉行的年會。這是國民黨退守台灣以來第一次現任政府高層官員在大陸公開亮相。一九九零年十月，李登輝總統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下稱「國統會」）規劃台灣的新大陸政策。同月，部長級的「大陸事務委員會」（下稱「陸委會」）問世，而同年十一月，統轄於「陸委會」的半官方機構「海基會」亦正式出現，進行與中共的「非官方」接觸及處理兩岸「民間」事務。

一九九一年二月，「國統會」宣佈其「國家統一綱領」（下稱「國統綱領」），明確規劃出中華民國政府處理兩岸關係的近程、中程及長程政策。「國統綱領」更特別強調，對等承認是近程政策的一項最重要目標，亦是由近程過渡到中程政策的首要條件。同年五月，總統李登輝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藉此宣佈中國共產黨不再是一個「叛匪」集團，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亦不再是一個「非法」政府。過去「賊漢不兩立」及由此形生的「反攻大陸」的極端性兩岸政策，從此成為歷史。

上述的政策與行動反映出在新的民主政治形勢下台北快速調整的、還在浮現中的大陸政策，及其要與北京發展出一

平等合作關係的積極與自信。一九九二年九月，「陸委會」終於通過了久受期待的、有關兩岸直航問題與前瞻的報告。這報告指出，唯有在北京公開解除對台武力威脅及承認中華民國為一對等的政治實體的條件下，中華民國才會與中國大陸建立海空直航。自一九七九年以來，開放直航一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政策的重要工作任務之一。這報告重申了台北政府在統一問題上的底線，那就是對等承認。

在推動北京政府以平等互惠的方式談判兩岸和平統一的同時，台北政府亦清楚瞭解到軍事力量在整個統一談判過程中的重要性。透過美國的援助，在過去十多年中，台灣已成功地將其相對過時的防衛系統予以更新（請參看轉變中的國際社會態度一節）。一九九二年，國民黨政府首次公開出版《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國防報告書》，背後的動機，除了因應民進黨的壓力³及民主化所需求的國防透明化外，顯然亦是藉此向其人民及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楚講述出其在新兩岸時期的國防政策。就國防政策而言，報告書最少強調了四個重點：（一）台灣放棄及反對運用武力解決兩岸統一問題；（二）台灣的國防政策重心是防守而非侵略；（三）台灣會因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發展而不斷強化其防衛能力；（四）台灣國防發展的主要目的是一個現代化自足防衛系統，重質多於重量。一九九四年夏，《中華民國八十二～八十三年國防報告書》亦告面世，在這定為兩年一次的新報告書中，台北重覆了上一期的主要觀點，並同時對北京近年的銳意擴軍表示嚴重的關注及憂慮。

在尋求對等承認及強化國防之外，台北政府亦努力突破其國際孤立的困境。一九九三年上旬，它公開表示重返聯合國的意願。事實上，此意願曾由民進黨於一九八八年首先提

出。當時，國民黨拒絕討論民進黨的訴求，因為它認為此訴求不單有離現實，亦與中華民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原則互相矛盾。然而，經五年快速民主化之後，國民黨已改變了其對有關問題的立場，而這亦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國民黨駕馭及善用國內發展中的民主力量以增加其在兩岸談判中的優勢的能力。一九九三年六月，總統李登輝親自表明同意尋求重返聯合國的提議，並以兩德及兩韓的模式為喻，認為台灣的新立場並沒有違反「一個中國」的政策原則。約同一時候，台北外交部成功地發動七個拉丁美洲國家支持台灣重返聯合國提案。然而，這提案在未抵達聯合國大會前，便先為其總務委員會所否決。

雖然重返聯合國的企圖初嘗敗績，但台北當局並沒有氣餒，繼續以各種方式尋求擴大其國際參與。最新亦是最近的一個策略是所謂「渡假外交」，其目的除了要開創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外，亦有意引渡部份大量流向中國大陸的台灣資金往東南亞發展，藉此拓展台灣在東南亞的經濟潛力，以及減輕在兩岸關係未正常化前過份依賴中國大陸所隱含的政治風險。後者的意向廣泛地被認為是中華民國政府刻意主導的「南向政策」，與由血緣文化及經濟成本自然帶動的台灣資金「西進」（大陸）的趨向相對。⁴事實上，台北的「渡假外交」與「南向政策」可謂互為表裡、相輔相成。前者可替後者打開東南亞的投資空間，而後者則可幫助前者強化國際連繫。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行政院長連戰「私訪」新加坡，並與數位新加坡高層官員會面。一九九四年二月，總統李登輝更進一步訪問了泰國、印尼及菲律賓，並在訪問期間，與被訪國簽署了一系列貿易及投資協議。自然地，北京先後提出抗議，同時亦指責台北企圖分裂中國。但無論如何，這些

抗議並不見得可以制止台北的「私人訪問」，因為這已多少屬於受訪國的內政。另一方面，雖然台北及被訪國均重申這些訪問屬「私人」性質，然而事實上，除了名義外，它們很明顯完全是官方的。這些東南亞國家之所以公開不理會北京的反對，願意接待連氏及李氏，某種程度上亦證明了台灣在亞洲日益壯大及難以忽視的地位。從高度互賴、分工的國際政治經濟的角度看，持續將經濟強勁如台灣這樣的一個地方排擠於亞洲地區活動之外，對任何國家均無益處，特別是對亞洲整體。此外，東南亞國家的經驗亦充份顯示，在「一個中國」的限制下，還是有其他方法與台北建立實質的連繫的。

一九九四年五月，李氏再將其國際訪問延伸至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南非及史雅濟蘭。這四個國家均屬世界上承認台灣的中華民國僅存的二十九個國家行列。在參加南非總統的就職典禮上，李氏會晤了超過二十位外國領袖，當中絕大多數均與台北沒有正式邦交。此外，李氏亦與美國副總統戈爾見面及握手（*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9, 1994:18）。

就喚起國際社會的注意而言，台北的新外交取向可算相當成功，但若從其尋求重返聯合國的嘗試看，便明顯戰略意義多於實際意義。首先，在與台北存有正常邦交的二十九個國家當中，除南非外，全數在國際政治中沒有任何重要的影響力。其次，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永久會員國，北京有否決任何國家申請加入聯合國的權力。事實上，北京亦反覆表示不會容許台北以任何形式加入聯合國。不過，從台北的姿態看，它正是要藉此將台灣問題國際化，以替其對等承認的政策先打開國際討論空間。

為了反擊台北近年轉趨積極的國際化活動，北京除對國際社會施加壓力外，亦於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公佈了「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對台北近年的一些轉變立場及幾項擴大國際參與的舉措作出了系統性的批判。首先是有關運用武力的問題。如前所述，在其一九九一年通過的「國統綱領」中，台北要求北京公開放棄以武力達成兩岸的統一。針對此一要求，白皮書重申北京一貫的立場，認為「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有權採取自己認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軍事手段，來維護本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其次，白皮書亦否定了台北以德韓模式重返聯合國的企圖，並態度強硬地表示，「台灣問題純屬中國的內政，不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國際協議而形成的德國問題和朝鮮問題。因此，台灣問題不能和德國、朝鮮問題相提並論。中國政府歷來反對用處理德國問題、朝鮮問題的方式來處理台灣問題」。其三，北京不單反對台北重返聯合國，白皮書亦明言除聯合國外，「其他政府間國際組織，原則上台灣也無權參加」，而「只有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立場的前提下，中國政府才可以考慮，根據有關國際組織的性質、章程規定和實際情況，以中國政府同意和接受的某種方式，來處理台灣參加某些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最後，白皮書強調，「一國兩制」是北京在兩岸和平統一問題上的最高原則。據它的解釋及界定，「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中央政府在北京……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大陸的社會主義和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實行長期共存，共同發展……台灣將成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文匯報》，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

經過近一年的反覆思量與部署，台北亦於一九九四年七月五日公佈了其第一份「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對北京的白皮書作出了回應，並再次強調對等承認是兩岸關係正常化的先決條件。整體而言，說明書不單回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白皮書的批判，更總結了台北政府近年在統一問題上發展出的主要觀點。這些觀點包括：（一）台海兩岸分裂源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後來中華民國政府從南京經廣州撤退到台北。自此以後，國共雙方分別在「台海兩岸維持互不從屬的獨立統治」。（二）中國的分裂不但是國共兩黨權力鬥爭的結果，它亦深刻地受到國際政治及外來意識形態支配的影響，二者最終造成國共的長期分裂與對立。（三）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已公開揚棄了利用武力達成兩岸的統一。（四）「一個中國，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而非「一國兩制」，才是解決海峽兩岸矛盾的方式。兩岸關係雖非國際性事務，但亦不純然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問題。（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一國兩制」並不可行，因為「一國」意味中華人民共和國吞併中華民國，而「兩制」則會使台灣從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之下。（六）兩岸關係應基於理性、和平、平等及互惠的原則進行。（七）假若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民主政治，台灣人民將會支持統一，相反，北京的不良政策及統治將會助長台灣的分離主義。若將這些觀點歸納一起看，說明書明顯要強調，當今的中國是分裂的，而兩岸要和平統一，必須回歸到這分裂的基礎上，以對等的方式進行和解，一味打壓，只會將台灣人推向分離主義。換言之，說明書不單將分離主義的發展與北京對台政策直接連繫起來，亦間接否定了其過去與北京一貫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對今天的台北而言，「一個中國只是一個理

想」（《台灣聯合報》，一九九四年八月十日），而台北目前的新兩岸政策是「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台灣聯合報》，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綜合地看台北對待中國大陸及國際社會的新取向，不難發現，它的對等承認底線非常清楚及強硬。無疑，台北不會不明白北京潛在的巨大威脅及國際影響力，但它亦沒有低估其經濟實力及快速浮現的民主現實。十分明顯，它企圖利用後者的優勢去影響及結構其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不管最終的結果是統一還是獨立，而新的兩岸關係又會倒過來成為其進一步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的條件（或藉口），如此循環往復，民主化與兩岸關係便在一種既開放、但在某種程度上又受到台北政府操控的情況下互為推動地發展下去。

中國大陸的內部發展

中國大陸的內部發展，特別在政治上，在可見的將來亦壓抑了日趨民主化的台灣社會尋求和平統一的意願。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一九七九年開始便進行經濟改革及開放，但政治上，它仍維持著 Edwin Winckler（1987）所謂的「硬性威權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對非社會主義的民主及政治自由化運動施以無情的壓制。在過去十五年的經濟改革中，由於種種權力或現實的考慮，大型的政治整肅幾乎每三至五年便要發生一次。最轟動世界也是最慘不忍睹的一次當然是一九八九年於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六四事件」。在是次事件中，北京政府動用了武裝軍隊鎮壓了當時正在北京進行的民主運動，造成了數以千計的平民傷亡。這次事件，以及過去其他較小型的政治整肅，強化了國民黨政

府長期以來有關共產主義的「邪惡」的意識形態宣傳。此外，在「六四事件」之後，北京政府極力否認傳媒有關六四事件的報導亦進一步打擊了台灣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信心（Bush, 1992:358-359）。

假若「六四事件」及其他政治整肅確如北京政府所一直宣稱一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鑑於當時情況而作出的明智行動，並不應損害到台灣人的信心，九四年春在浙江千島湖發生的慘案（通稱「千島湖事件」），從哪一方面看均暴露了兩岸在人權、法律習慣及政府行政的鴻溝。在這次慘案中，一艘商業遊艇於千島湖旅遊區被發現焚毀，艇上三十二人全部罹難，其中二十四人是台灣旅客。事件發生後約一星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不斷堅持這是一次意外，死者的屍體未經家屬授權便遭受解剖，而死者的家屬亦被迫接受將屍體就地火化。雖然後來北京改口承認是次慘劇存有人為因素，但它仍然拒絕台灣「海基會」代表台灣死難者的家屬處理各種善後問題。北京的處理手法嚴重地觸怒了台灣民眾，導致了台灣社會與政府的強烈抗議及批評。總統李登輝在一次對本地官員的講話中，甚至以「土匪」形容北京政府。這樣情緒化的說話，在近年日趨緩和的兩岸關係中，可謂絕無僅有。

是次事件的即時效應是它進一步擴大及鞏固了台灣內部反對與共產中國統一的共識。事件發生後的兩個星期，兩個分別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均顯示台獨支持率快速爬升，由事件前的 20-23% 攀上 27% 以上的歷史高峰（*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1, 1994:24;《明報》，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八日）。此外，根據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一九九四年七月上旬（即事件發生後的三個月）進行的一個民意調

查報告指出，上述百份比後來雖然有回落跡象（至 24%），但有 52.1% 的受訪者主張維持現狀，包括 42.2%「主張維持現狀以後看情況再決定統一或獨立」及 9.9%「主張永遠維持現狀」（《台灣聯合報》，一九九四年八月四日；《台灣自立晚報》，一九九四年八月四日）。換言之，若這調查結果有一定的代表性，這意味超過七成半以上的台灣人民是屬於永遠的分離主義者（台獨支持者及永遠維持現狀的支持者）或現實的機會主義者（視情況而定者）。對任何兩岸政策的制定者而言，這絕對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變化。

另一方面，對台北政府來說，是次事件亦造成數方面的有利形勢。（一）它擴闊了台北政府在國際舞台的游說活動空間，因為它所突顯的兩岸在觀念及制度上的巨大差異將成為台北的國際化計劃的最佳理據。（二）台北的「南向政策」亦應會因這次事件得到新的動力：沒有正式的外交保障，台灣人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就好像旅遊一樣，隨時隨地均存在難以預料的風險。（三）它給台北提供了冷卻及操控兩岸關係發展的機會。事實上，台北當局亦幾乎即時終止了與大陸的文化和教育交流及某些台灣公司在大陸的間接投資申請審批。（四）台北政府的民主政治改革進一步受到肯定與強化，而民主化亦會越益被裝扮成台灣人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周旋的最重要武器。

無可否認，「千島湖事件」只是一次意外事件，然而若放在兩岸關係上看，它所象徵的意義又遠非一普通的意外事件所能涵載，因為在各方面仍相當落後的中國大陸，類似「千島湖事件」的重大刑案及意外仍會無可避免地不斷發生。惟其如此，在台灣人的心目中，「千島湖事件」所揭示的，已不再是一件普通的重大刑案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偶

然的行政錯失，而是兩地思維、經濟及制度暫時仍不易克服的差異。這些差異，正是兩岸和平統一的主觀及客觀障礙。

「一國兩制」及香港的經驗

另一方面，「一國兩制」的理念及香港以「一國兩制」的模式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的經驗，亦不易為台灣方面所接受。自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後，北京便開始蘊釀以「一國兩制」的模式達成台海兩地的統一（蔡政文、包宗和，1991：105-106）。而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北京政府更清楚指出，兩岸和平統一的模式應以香港的「一國兩制」為本，儘管透過協商，台灣可享受較香港更多的優惠待遇。如早前說過，九三年公佈的兩岸關係白皮書，仍然堅持「一國兩制」在兩岸統一問題上的正確性和可行性。換言之，「一國兩制」是北京過去十多年來處理兩岸關係的一貫立場。

根據北京的解釋，「一國兩制」是指一個單一制度的國家，根據憲法的特殊規定，容許國內某些地區採取基本上與全國有異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雖然如此，這些地區政府只是地方政府，除非中央政府經法律程序予以特別批准，地方政府不得行使國家主權（蔡政文、包宗和，1991：106-107；Liao，1991：4.4；《文匯報》，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基於此理解，並經數年的準備、諮詢、論商、草擬及修訂，北京於一九九零年四月通過並刊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基本法」），成為一九九七年後在「一國兩制」的模式下管治香港的小型憲法。

「基本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只「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和「防務」，而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享有高度自治權」。然而諷刺的是，「基本法」卻刻意將香港將來特區政府的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發展限制在北京所能容易控制的程度下（Kuan, 1991:5-14）。以原先可過渡到九七特區立法會的一九九五年立法局的組成為例，只有三分之一議席或是總數六十席中的二十席是經直選選出，而到二零零七年，直選議席仍不過佔總議席的一半（三十席）。因此，當一九九二年十月新任港督彭定康由於不明的原因（一般的猜測包括英國改變對華政策、扶植親英政治力量以維持九七後英國在香港的殖民地利益等），利用「基本法」的灰色地帶，推出其政治改革方案以擴大立法局的民主基礎時，北京政府異常憤怒。其後經過約半年的持續罵戰，中英政府終於冷靜下來，並開始了有關香港未來憲政安排的長時間談判。然而，由於分歧太大，談判終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破裂，而事後雙方政府均指責對方缺乏誠意。自此之後，彭定康仍按計劃推動其原來的政制改革；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亦公開宣佈香港三級（立法、市政及地區）議會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均要解散重組，並開始直接積極地作出全面接收香港的準備，「另起爐灶」，儘管民主派團體不斷譴責它的做法違反「基本法」。

就經驗而言，上述香港有關「一國兩制」的理想與「基本法」規定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中英港三方面在政改問題上所展露的政治角力和權鬥，以及香港人在整個過程中所表現的無力感（鄭宇碩，1994：19），相信「一國兩制」只會將台灣人趕離統一，而非吸引前來。再者，縱使台灣人未必注意到香港的發展，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還有一段時

間，而之後台灣人亦需要長時間的觀察才能實在地判斷「一國兩制」的模式是否適用於他們的情境（Bush, 1992:359）。

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驗及其所需的評估時間也許還是次要，對台灣人而言，「一國兩制」作為一個政治概念，可能根本毫無吸引之處。香港中文大學廖光生教授在一九九一年便曾一針見血地說過：

對於他們的前途，台灣人較香港人有更多的選擇。首先，台灣與大陸隔了一個台灣海峽，亦因此在自然環境上，台灣與大陸的分離比香港更徹底，中國大陸要動用武力對付台灣亦不見得容易。其次，台北政府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制度。雖然台灣現在正經歷政治轉型，但國民黨仍有足夠能力維持政治秩序及推動經濟繁榮。現時大陸要推翻國民黨統治會十分困難。其三，台灣現時無疑遭受國際孤立，然而其國際貿易卻發展迅速。對外貿易總額已達八百八十億美元，在世界排行第十三位。台灣人生活舒適和平，較中國大陸的生活水平高出很多。這些客觀條件均會成為台灣人民及其政府抗拒由中國主導的統一。（Liao, 1991:4.5）。

廖光生教授還是就一九九一年台灣的客觀條件而論，一九九一年距今已三年有多，台灣也起了許多巨大的變化，特別是在政治上。如文首所說，今天台灣的民主政治改革已屆完成階段，要一個長期擁有現實獨立主、治權，並且制度上已具相當規模的民主化公民國家，接受並從屬於由另一個主權國家設計及支配的「一國兩制」安排，不論在心理感情、權力利益或民意取向的考慮上，相信均會存在極大的困難。更何況，統一對象的中國大陸在各方面仍相對地十分落後。這似乎正是台北政府及台灣人民在統一問題上最猶豫的地

方，而台北政府之所以一直堅持以對等承認作為兩岸和平統一的條件，多少反映出它在民主政治的壓力下所能作出的最大讓步（Chao and Myers, 1994:229-230）。

轉變中的國際社會態度

一直以來，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的態度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亦十分關鍵。雖然一九七九年元月華盛頓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與台斷交，但美國國會隨即於同年三月通過、並於四月份總統卡特簽署生效的「台灣關係法」，將台灣的將來與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安全緊密的連繫起來（Lasater, 1984:161）。就該關係法的條文看，美國的對台政策是要讓台灣能以和平的方式決定其與中國大陸未來的關係。事實上，關係法明言，美國有法律責任保護台灣的安全，包括向台灣提供防衛武器及服務。換言之，美國將不會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亦因為如此，雖然一九八二年八月的「中美聯合公報」對美國軍售台灣作出多方限制，⁵但在後來的十多年中，美國仍然成功地更新了台灣大部份的落後防衛系統，包括「一支具反海、反潛及反空能力的艦隊、先進戰鬥機、現代化戰鬥坦克及一系列地對空、空對空及反海導彈」（Bush, 1992:352）。

進入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國際政治發展進一步強化了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承擔。首先，在戈爾巴喬夫的領導下，蘇聯在八十年代中開始引進政治改革及努力改善與西方的關係，這變化使中國對美國及西方的全球戰略重要性迅速減弱。更糟透的是，隨著八十年代末整個東歐共產主義陣營幾乎在頃刻間崩潰，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成為意識形態上唯一與

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敵對的超級大國。此外，一九八九年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六四事件」亦嚴重地動搖了西方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改革及開放下向民主政治和平轉變的樂觀看法。最後，台灣近年快速的民主化及其難以忽視的經濟力量，亦使西方繼續維持一個僵固的「一個中國」政策出現極大的道德及現實困境。

由於上述出人意表的發展，美國在一九九二年九月終於決定同意向台灣出售一百五十架先進的 F-16 戰機。幾乎同一時間，法國政府亦允諾售賣六十架幻影戰機予台灣。對於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然作出強烈的抗議及譴責，因為這不單表示西方開始背離「一個中國」政策的原則，亦會大大改進台灣的防衛能力，使北京對台的軍事壓力相對減弱。然而，美法二國似乎早已計算到北京的反應。⁶撇開經濟考慮不論，它們不顧北京的反對或可能的報復，仍堅持其軍售台灣的計劃，某種程度反映出近年國際社會對台態度正在急遽轉變之中。九四年七月初，中南美洲十二國再度聯署，重新支持台灣重返聯合國。數天後美國前駐華大使李潔明和前助理國務卿波爾頓在美國國會一個聽證會上發言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約兩個月後的九月八日，克林頓政府進一步宣佈調整及改進自美台十五年前斷交以來的停滯關係，包括恢復美台在經濟及文化上的官方高層接觸，接納台北駐美機構名稱由現時的「北美事務協調會」升格為「台北經濟及文化代表處」，以及再次強調「台灣關係法」仍是美台關係的基礎（亦即突顯了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台灣聯合報》，一九九四年九月九日）。毫無疑問，這接二連三的變化均顯示國際社會對華態度轉變的進一步擴大及明確化。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似乎已越來越同情台灣當今的處境，不願意看見台

灣因相對的軍事弱勢而被迫與中國大陸統一。在這一點上，美國學者 Richard C. Bush（1992:355）的看法或許可供參考：

美國是要保證，假如當台北選擇與北京談判台灣的未來時，它不是因為軍事弱點才如此做……因為台灣已正在恢復其保衛自己的信心，美國的軍事及安全服務亦已準備支援台灣的文人領導層更彈性地與大陸談判。這決定並不見得為中國政府所接受，但美國亦沒理由要接受他們對有關形勢的定義。

從台灣、中國大陸及國際社會發生的轉變及互動看，美國和很多其他國家明顯轉趨準備在中國統一的問題上採取一政治中立的態度。或許更準確的說，它們希望台灣能在決定其將來時免受武力威嚇，而不是在條件還未成熟前便迫使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妥協。

兩岸和平統一的有利因素

儘管兩岸和平統一遭遇很多巨大的障礙，有利的因素畢竟仍然存在。當中最重要而且還在繼續發揮難以估計影響力的，無疑是兩岸日益密切的社會、文化及經濟互動。在一九八七年末總統蔣經國逝世前夕，為了配合政治改革的需要及在本土社會的壓力下，台北解除探訪大陸的限制，准許非公職居民回大陸探親。如今，除少數政府高層官員外，台灣人基本上已可自由進出大陸。此外，台北亦於一九九零年開始讓大陸人民探訪台灣，雖然審批程序仍十分嚴格。無論如何，隨著互訪的開放，各類文化、社會及學術接觸迅速增

加，無數的交流計劃、訪問、講座及研討會等不斷在海峽兩岸舉行。經數十年軍事及意識形態對抗及隔絕之後，兩岸人民終於有了真正接觸及瞭解的機會（Chiou, 1993:9.8）。

然而，最重要的交流是來自經濟領域。一九八五年，台北放寬其對大陸貿易及投資的嚴厲控制，雖然直接貿易至今仍在禁止之列。自此之後，台灣在大陸的非直接貿易及投資（主要經香港）展現了驚人的成長（Sung, 1992）。在一九八五年之前，兩岸貿易幾乎不存在，但單是一九九三年，它已增長至 143.9 億美元，使台灣成為中國大陸的第四大貿易伙伴（Lo, 1994:4.3）。此外，根據中國新華社新聞發報報導，台灣在大陸的投資亦由一九八七年的一億美元躍升至一九九三年的一百億美元（王家英，即將出版），台灣亦因此成為中國第二大投資者，僅次於香港。同年，超過一萬家台灣公司及企業在大陸營業（Lo, 1994:4.3）。

如果社會及文化的交流推動了兩岸彼此的認識與瞭解，經濟的互動明顯實質地促進了雙邊經貿的發展、互補及融合（簡澤源，1994；Sung, 1992:20-26）。由於文化、地緣等各種親近因素（Sung, 1992），這些與日俱增的交流互動勢難禁絕，且在某些地方（特別在經濟上）對兩岸雙方亦具有難以抗拒的好處，亦因此無可避免地會推動或迫使兩岸政府尋求某種雙方均可接受的合作機制，以規範其正常的發展及協調當中可能衍生的摩擦和糾紛。早前提及的由台北政府於一九九零年成立的「海基會」，主要便是在這種情境下催生的。而一方面為了回應台北的做法，另一方面也為了現實的需要，北京亦於一九九一年設置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雖然兩會名義上均自稱為非官方組織，以避免政治紛爭，但實際上二會均代表及直接授權自其所屬政

府。自此之後，兩會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嘗試建立初步形式的合作關係。一九九三年四月，一個極具象徵的突破終告出現：兩會會長——「海基會」的辜振甫及「海協會」的汪道涵——於新加坡舉行了兩會建會以來首次的高層會談，亦即是一般所謂的第一次「辜汪」或「汪辜」會談。⁷ 這次會談達成及簽署了數項協議，包括文件鑑證和掛號信件服務。雖然如此，在某些領域上，它們仍存有很大的分歧，特別是牽涉到國家主權的事務，如劫機犯遣返及台資利益保障等。

「辜汪會談」之後，兩會分別於同年及九四年初在北京及台北舉行了數次層級較低的會談，可惜均沒有得出任何顯著的成果，國家主權仍然是雙方爭持不下的核心。台北認為，要達成任何重要的雙邊協議，北京必須以某種形式承認台灣為對等政治實體；恰恰相反，北京則盡量避免與台北達成任何可能暗示對等承認的協議。

不過，經過約一年的僵持，加上台灣的快速公民國家化和「千島湖事件」後台灣急劇上升的分離主義情緒，北京政府似乎明白到某種程度讓步的迫切性，開始鬆動其對台北的對等承認政策的強硬否定立場。在九四年八月於台北舉行的二次「焦唐會議」中，它不再明顯否定台北政府在台灣的司法權，使「海基會」與「海協會」終達成了三項重要事務性協議，包括偷渡客遣返、劫機犯遣返和漁事糾紛處理。台北認為，不明顯否定其司法權多少暗示不否定其政治實體。當然不否定並不表示承認，但對於台北來說，這已是一重要的突破。另一方面，北京雖然已越來越意識到對等承認對台北的重要性，特別在台灣已相當民主化的今天，然而它亦憂慮，一旦給予台北明確的對等承認，台北並不必然會積極尋

求統一，但卻有可能利用對等承認的約束力，從事北京莫之奈何的長遠而實質的分離。⁸

結論及討論

如無任何突如其來的巨變，海峽兩岸的經貿、社會及文化互動相信仍會繼續以高速發展，從而形生更大的壓力推動兩岸政府加快進行種種形式的接觸、連繫或合作。然而，這些接觸、連繫或合作，並不必然促成兩岸和平統一。相反，在兩岸猜疑仍深的今天，它們或會強化分離主義情緒。事實上，若參看兩岸三地及國際社會的其他發展趨勢，包括台灣本土持續深化及快將完成的民主政治改革、中國大陸在可見的將來還不易有大幅改變的整體生活水平及共產主義政治制度、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上出現的爭拗及時差，以及國際社會在中國統一問題上日漸浮現的政治中立態度，兩岸和平統一的希望非但難言樂觀，甚至可以說極端困難。尤其是台灣持續快速的民主化，它一方面會使台灣人越來越對任何低於對等性的兩岸統一失去興趣，另一方面又會替西方民主國家繼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帶來巨大的道德難題，從而迫使它們更加傾向支持台灣在免受武力威脅下決定其與中國大陸的將來關係。當然，北京政府仍可不惜任何代價，以武力迫使台灣就範。縱然如此，從任何角度看，不管如何符合國家主權原則，武力解決兩岸統一問題只能是下下之策，甚至可以說是悲劇，因為它並不保證一定成功（當中可能引發國際干預），而即使成功，北京仍將面對戰爭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壞，包括物質、人命和台灣民心。

如果武力解決兩岸統一問題是下下之策，那麼，如何才是兩岸關係理性的出路呢？根據美國學者 Thomas W. Robinson（1992:378-384）的分析，目前兩岸關係的發展最少存有八種可能的結果：（一）經雙方同意的自主性統一（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建立並平等地從屬於某種更高形式的國家架構之下，而在這國家架構內，除共同國防和外交外，雙方仍可保持對其領土的高度主、治權）；（二）經雙方同意的從屬性統一（台灣同意統一及從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單一政治制度之下，成為地方政府，如北京一直堅持的「一國兩制」）；（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武力迫使台灣投降而達成統一；（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武力佔領台灣而達成統一；（五）未經北京同意的情況下台灣宣佈獨立；（六）經北京同意下台灣宣佈獨立；（七）兩岸保持合作接觸但未有明確獨立或統一目的；（八）兩岸繼續保持國際競爭以待進一步變化。

在這八種可能的結果中，（三）與（四）涉及武力；而（五）最終亦可能導致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極可能以武力制止台灣未經同意的獨立，正如它反覆宣稱一樣）。只有（一）、（二）、（六）、（七）及（八）由各種形式的妥協造成。如上所述，既然任何解決台海矛盾的理性出路必須盡可能避免動武，則對上述五種妥協的結果作出分析便顯得勢有所需。

在可見的將來，（二）和（六）雖有其可能性，但機會不大。台北政府及台灣人的普遍態度一直顯示，他們不會接受任何在共產主義單一制度下與中國大陸的從屬性統一。另一方面，北京政府亦公開反對台灣獨立的一切可能性。因此之故，餘下的（一）、（七）和（八）看來較可能為台北及

北京接受。對台北而言，上述三種結果或多或少均同等地可以接受，起碼在短期內，因為它們都沒有明顯地背離其對等承認的政策原則。相對之下，北京的選擇空間便小了很多，因為（七）和（八）均不保障兩岸的最終統一，而統一卻是它一直以來所堅持的。

換言之，在 Robinson 歸納的八個兩岸關係的可能結果中，現階段最可能為兩岸政府及人民共同接受的應是經雙方同意的自主性統一。⁹ 話雖如此，當中還有一個重要障礙，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至今仍然拒絕承認台灣為一政治實體。從這一角度看，如果北京不想看見台灣繼續分離於中國大陸以至最後真的走向獨立建國的方向，或不願承受武力統一台灣所暗含的各種巨大風險，它必須作出某種程度的妥協，以減低台灣與共產中國統一所產生的恐懼。對北京或台灣獨主義者而言，經雙方同意的自主性統一並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但它包含了和平統一所需的最起碼妥協，使一方面不損兩岸政府現階段在其管轄領土上的主、治權，而另一方面又可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建立一更高的國家機制達成兩岸的形式統一。雖云是形式，但它卻具體地將現階段不明朗的兩岸關係明朗化，使其正式明確地納入中國的國家理念及規範中發展。這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因為它既可消彌由對抗所助長的台灣分離主義，又可提供規範性的空間讓兩岸建立互信合作的基礎與機制。沒有此基礎與機制，任何主觀的、單方面的統一理想，均只能是空話，更遑論中華民族的和平興盛。

話說回來，除了心理方面，自主性統一對兩岸政府及人民均難言損失。首先，由於自主性統一保持了兩岸政府對其領土的主、治權，雙方並不能干預對方的事務。其次，自主

性統一下的中國國防及外交形式與內容，亦可透過談判協商作出不同層面的規定與限制，並不一定帶來任何一方的權力的喪失。相反，由於有了規範性的合作基礎，兩岸雙方卻可在國防上建立共同防衛系統，減少過去因互相敵視所付出的龐大軍事開支，¹⁰ 從而更能集中資源推動兩岸的經貿發展與社會融合。

台灣內部的政治發展一日千里，自主性統一在現階段或許還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時過境遷，基於現代民族國家主權在民的原則，待九六年總統直選以後，中華民國主權更名符其實是中華民國主權在台灣體現，而在國家及人民主權一體化的結構環境下，北京要與台北達成統一的協議將更不容易。至若分離主義進一步擴大及與民主化過程結合，最後不理北京的警告，通過民主程序要求更改國號，獨立建國，那結果便更難想像了。

註釋

1. 據 Hobsbawm 和 Smith 的分析，民族主義必須具有某種原初感情（*primordial sentiments*）及特殊的文化元素（如語言、宗教、風俗、倫理、價值等），以凝聚團結同族群的人，雖然它亦強調民族國（*nation*）建構的前瞻性層面。
2. 台灣化發生於兩方面：（一）外省籍族群在國民黨國家的支配地位漸漸被一九四五年前便定居下來的台灣人或其後裔不斷增加的政治參與所糾正；（二）外省籍族群，特別是其第二代，亦漸漸同化於台灣，並自稱為省籍及族群意義下的台灣人，雖然這同化存有各種結構的矛盾（戴國輝，1989；王甫昌，1993）。

3. 與民進黨關係密切的台灣研究基金會，於一九八九年首先出版了《國防白皮書》，詳細探討了台灣當前的戰略環境及新兩岸關係下台灣應有的國防政策。書中的主要觀點對後來官方出版的報告書影響甚深，從中亦可窺見朝野在國防政策上的一致性。
4. 其實，將「南向」與「西進」完全對立起來似乎不符合事實，亦不見得是台北政府的真正動機。在考慮到過量「西進」會一方面削弱台灣在整個亞太區的平衡發展及影響力，另一方面造成對大陸過度依賴，台北「南向政策」的真正目的，應是如何在「西進」與「南向」之間取得某種平衡，而不是以前者終止後者。
5. 一九八二年八月的「中美聯合公報」規定，美國政府表明不會爭取進行長期軍售台灣的政策，其對台軍售不論在質量或數量上均不會超越近年中美建交以來的水平，以及有意逐漸減低軍售台灣，俾使在一定時間內達到問題之最終解決。
6. 就現實政治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向美國報復的地方不多，因為中美經濟連繫日益密切，且對中國有利，而北京亦需要繼續爭取美國的最惠國待遇以發展經濟。相較之下，法國與中國的經濟連繫便薄弱得多。亦因為如此，北京很快便向法國進行報復，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八日關閉了法國在廣州的領事館，以表示其憤怒。
7. 由於對主權及主從等意識形態的執著，兩岸政府對會談的定名先後這等微不足道的事亦各不相讓，難有共識。結果北京稱之為「汪辜會談」，而台北則是「辜汪會談」，以突顯各自的主導性。於此亦可見兩岸政府成見之深和不易妥協的性格。
8. 北京對台灣的分離主義持強烈否定立場，最少有兩點主要原因。第一點是中國意識。過去中國五千年王朝歷史無疑是一部專制史，但透過其本身的歷史擴張及融合，它亦形成了一種文化秩序和民族的統一感，沒有這文化

秩序和民族統一感，中國近代史上兩次民族革命是很難得到充份理解的。中國近代革命先烈，不論是孫中山還是毛澤東，均有重建大一統中國的文化及民族使命，亦因為如此，由毛澤東帶領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諸領袖，包括今天的北京領導人，便很自然地視統一兩岸為不容懷疑的信念與責任。當然，從分離主義者的觀點看，這信念與責任或許不過是大漢沙文主義的表現，但在現實的兩岸談判中，它們正是分離主義者所必須正視和面對的。隨意將之標籤為大漢沙文主義只能加深雙方的對抗，因為從中國意識的角度看，分離主義是對中華民族的背叛，對之阻止自是義無反顧，談不上什麼大漢沙文主義。另一點須要注意的是台灣的戰略地位。從地理上講，台灣扼中國東南門戶之要衝，對中國東南部有異常重要的戰略意義，這正是過去數百年來列強環視爭奪台灣的最主要原因。在利益爭鬥仍然支配國際關係和發展的大環境下，縱使北京領導層能擺脫中國意識，但考慮到台灣的現實戰略重要性，相信在現階段亦極難讓台灣從容分離獨立。因為分離獨立的台灣或與中國為敵，或落入列強控制之中，中國東南部的安全便頓失屏障。若明瞭到這一點，便不難明白為何中共對統一的形式較為寬鬆，但對分離主義特別是台獨要求卻絕無轉圜的餘地。

9. 有關自主性統一的各種可能模式，海內外學者近年亦多有討論，而比較流行的有兩種，一是聯邦制，另一是邦聯制。聯邦由兩個或以上的成員國組成，設有最高立法和行政機關，有統一的憲法和法律，而在國際交往中，聯邦以政治主體行使外交權力。邦聯雖也由兩個或以上的成員國組成，但並不預設一更高的國家形式，組織也鬆散得多，成員國除了遵守為特殊目的（如軍事、經濟等）達成的協議外，各自均有立法、外交、軍事、行政、財政方面的全權。在現階段，兩岸由於差異過大，互信不足，邦聯制的可行性較大，因為它替兩岸雙方均

保留了大量的空間獨立發展。不過，不論是邦聯制還是聯邦制均只是抽象的模式，具體的自主性統一形式和內容畢竟須要兩岸雙方共同協調商定，而最終的統一模式極可能是邦聯制與聯邦制的某種混合模式（有關邦聯制和聯邦制的討論與分裂國家的統一模式的分析，可參看嚴家其（1992）的《聯邦中國構想》，林濁水（1991）的《國家的構圖》與張五岳（1992）的《分裂國家互動模式與統一政策之比較研究》）。

10. 例如據台灣國防部（1994）自己的統計，一九九四年度國防預算總額佔政府總預算 24.28%，但這百份比並沒有計算每年龐大的軍事採購及與國防部有關但不屬國防部支出的各種特殊編算。據台灣研究基金會（1989：120）的研究顯示，台灣的國防預算一直佔政府總預算 40-50% 之間，為中華民國政府施政的重心。如將這百份比與世界平均百份比 13-15% 比較（台灣研究基金會，1989：120），它高出後者三倍有多。而即使以國防部的計算為準，仍高出近一倍。

參考書目

- 王甫昌：〈省籍融合的本質〉，載張茂桂等編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頁53-100。
- 王家英：〈民族主義與台灣人的歷史掙扎〉，《信報財經月刊》，總194期（1993），頁38-41。
- 王家英：〈國際政治經濟、國家與台灣階級發展〉，載劉兆佳等編：《發展與不平等：大陸與台灣之社會階層與流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即將出版）。
- 《台獨季刊》〔紐約〕：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 《台灣自立晚報》：一九九四年八月四日。
- 台灣研究基金會：《國防白皮書》（台北：台灣研究基金會，1989）。
- 《台灣聯合報》：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九九四年八月八日；一九九四年八月十日；一九九四年八月四日；一九九四年九月九日。
- 吳乃德：〈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台灣族群政治理論的初探〉，載張茂桂等編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頁27-52。
- 林濁水：《國家的構圖》（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 林勁：《「台獨」研究論集》（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3）。
-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三年九月一日；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四日。
- 《明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九九四年四月八日。
- 施敏輝編著：《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加州：台灣出版社，1985）。
- 高英茂編：《「台灣經驗」新階段：持續與創新》（台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1991）。
- 國防部：《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國防報告書》（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2）。
- 國防部：《中華民國八十二～八十三年國防報告書》（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4）。
- 張五岳：《分裂國家互動模式與統一政策之比較研究》（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

張茂桂等編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

蔡政文、包宗和：〈海峽兩岸關係的持續發展與法制化〉，載高英茂編：《「台灣經驗」新階段：持續與創新》（台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1991）。

蔡政文等：《我國對外政策及行動取向》（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

鄭宇碩：〈中英對抗與香港的管治危機〉，《明報月刊》，總三三九期（1994），頁12-19。

蕭新煌：〈多元化過程中社會與國家關係的重組〉，載高英茂編：《「台灣經驗」新階段：持續與創新》（台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1991），頁375-400。

戴國輝：《台灣總體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

戴國輝：《台灣結與中國結》（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4）。

簡澤源：《崛起中的經濟金三角——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台北：永業出版社，1994）。

嚴家其：《聯邦中國構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

Bush, Richard C.,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aiwan-PRC Relations," in *Taiwan: Beyond the Economic Miracle*, edited by Denis Fred Simon and Michael Y. M. Kau (Armonk: M. E. Sharpe, Inc., 1992), pp. 345-368.

Chang, Parris H.,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aiwan's Politics," in *Taiwan: Beyond the Economic Miracle*, edited by Denis Fred Simon and Michael Y. M. Kau (Armonk: M. E. Sharpe, Inc., 1992), pp. 25-42.

Chao, Linda and Ramon H. Myers, "The First Chinese Democracy: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1986-1994," *Asian Survey*, Vol. 34, No. 3 (1994), pp. 213-230.

Chiou, C. L., "Relations with Taiwan," in *China Review 1993*, edited by Maurice Brosseau and Joseph Cheng (K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9.1-9.26.

Chun, Allen, "From Nationalism to Nationalizing: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Postwar Taiwa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1994), pp. 49-69.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1, 1994; June 9, 1994; June 23, 1994.

Gold, Thomas,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Sharpe, 1986).

Greenfield, Liah,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Hobsbawm, Eric,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Kau, Michael Y. M., "The ROC's New Foreign Strategy," in *Taiwan: Beyond the Economic Miracle*, edited by Denis Fred Simon and Michael Y. M. Kau (Armonk: M.E. Sharpe, Inc., 1992), pp. 237-256.

Kuan, Hsin-chi, *Hong Kong After the Basic Law* (Halifax: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 1991).

Lasater, Martin L., *The Taiwan Issue in Sin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Lasater, Martin L., *Policy in Evolution: The US Role in China Unific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Lasater, Martin L., "Taiwan'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edited by

- Thomas Robinson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1991), pp. 91-101.
- Liao, Kuang-sheng, "China's State Structure and National Unification," in *China Review 1991*, edited by Kuan Hsin-chi and Maurice Brosseau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1-4.22.
- Lo, Chi Kin,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in *China Review 1994*, edited by Maurice Brosseau and Lo Chi Ki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1-4.13.
- Myers, Ramon H, *A Uniqu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 Nathan, Andrew, *China's Crisis: Dilemmas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Robinson, Thomas W., "Beijing-Taipei Relations Approaching the Year 2000," in *Taiwan: Beyond the Economic Miracle*, edited by Dennis Fred Simon and Michael Y. M. Kau (Armonk: M. E. Sharpe Inc., 1992), pp. 369-386.
- Smith, Anthony D.,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
- Sung, Yun-wing, *Non-institu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Via Cultural Affinity: The Case of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2).
- Tien, Hung-mao, "Taiwan's Evolution Toward Democracy: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aiwan: Beyond the Economic Miracle*, edited by Denis Fred Simon and Michael Y. M. Kau (Armonk: M. E. Sharpe Inc., 1992), pp. 3-24.

- White, Lynn and Li Cheng, "China Coast Identities: 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 in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edited by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Winckler, Edwi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3 (September, 1987), pp. 482-99.

Democratization and Separatism

Taiw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and ROC-PRC Relations

Timothy K.Y. Wo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beginning in the 1980s and how it has contributed to shape local politics and Taiwan's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on the mainland. The general thesis is that given the conditions of a divided China and Taiwan's continuing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inevitably lends support to separatism which will (and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re)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aiwan-mainland relations. As such, the paper analyzes Taipei's changing approach to its relations with the mainla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nder democratization, as well as the various barriers and positive developments to reunification thus emerged. Lastly, the paper argues that among the various possibilities in Taiwan-mainland relations, the most rational outcome at the present stage is some form of "agreed-upon autonomous unification," as it does no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one China" yet promises the minimum sense of security for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o cooperate to br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to the region.